

明清时期武陵山区 经济与社会发展史论

——以黔东地区为中心



MINGQING SHI QI WULING SHANQU
JINGJI YU SHEHUI FAZHAN SHILUN
YI QIANDONG DIQU WEI ZHONGXIN

李锦伟 高应达◎著

大学
出版社

明清时期武陵山区 经济与社会发展史论



李锦伟 高应达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时期武陵山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史论：以黔东地区为中心 / 李锦伟, 高应达著.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81128-955-8

I. ①明… II. ①李… ②高… III. ①山区经济—经济发展—史料—西南地区—明清时代②社会发展—史料—西南地区—明清时代 IV. ①F127.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3552 号

明清时期武陵山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史论

——以黔东地区为中心

李锦伟 高应达 著

责任编辑：王正杰

封面设计：李平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0731-58298966 邮编：411105

网 址：<http://press.xtu.edu.cn/>

印刷：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

字数：298千字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1128-955-8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本书为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铜仁学院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和贵州省重点学科《民族文化遗产学》的成果。

贵州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铜仁学院武陵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协同创新中心资助出版。

目 录

上篇：经济篇

明清时期黔东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003)
农业结构的变化与明清黔东商品经济的发展	(014)
清代黔东地区手工业的发展	(024)
明清时期黔地酒业的发展	(033)
清代铜仁府商业的发展	(042)
清代黔东农村市场的发展	(051)
清代黔东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之内部条件	(060)
明清时期黔东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066)
明清时期高产作物的引进对黔东山的影响	(075)
外来移民对明清黔东地区开发的影响	(083)
明代铜仁城建考	(091)
明清以来黔东地区手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以万山汞业发展为例	(099)

下篇：社会篇

明代黔东民族社会历史变迁初探	(111)
----------------------	-------

明代黔中官和龙氏宗族历程探析	(121)
明清时期盘石营变迁考论	(135)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	(143)
丹砂与明清贵州的历史进程	(158)
明清时期梵净山佛教寺僧与社会公共事业	(167)
清代铜仁府女性自杀现象探究	(175)
黔东南与湘西交界处之南长城研究	(190)
(万历)《铜仁府志》文献价值研究	(202)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	(207)
明清科举制度对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负面影响	(220)
清代以降天主教、基督教在黔东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历史探析	(233)
参考文献	(241)

上篇：经济篇

明清时期黔东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全国商品流通范围和规模均有大幅度增长，流通的格局也有很大发展。较之于东部地区，明清时期黔东^①经济的发展虽然相对落后，但从本区域纵向来看，也确实取得了较大发展，这些发展和当时黔东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此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明清时期黔东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进行论述。

一、农业结构的调整

明清时期黔东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与变化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变化上。农业结构的变化大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及经济收益，同时也提高了种植业的商品化程度，从而推动了这一时期黔东经济的发展。

（一）粮食作物的种植与变化

作为粮食作物之大宗，水稻在黔东地区种植的历史较为悠久，但在明代以前其种植范围和规模还是相对有限。明初永乐时期，贵州的建省结束了该地长期处于边缘区划的局面，在这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及中央政策的影响，水稻的种植面积得到大幅提升。《贵州通志》卷三《土田》记载

^① 本书所涉及到的“黔东”或“黔东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今的铜仁市范围，即主要包括碧江区、万山区、玉屏县、江口县、印江县、石阡县、思南县、德江县、松桃县、沿河县等二区八县所涉及到的区域范围。

了明初思南等地因“田地随山开垦，散漫不一，难以记亩”，缺乏具体的数据，但依据思南等地“旧为荒裔，田无顷亩之制”^①的情况来看，思南在这一时期的水田开发应该是可观的。《大明会典》卷十七《户部四·田土》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贵州仅有田土516686亩，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贵州的田亩数是959711亩，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是250多万亩。贵州田亩数不断增加，黔东南地区的垦田数肯定也不断增加。并且黔东南一直以来都种植水稻，随着垦田数量的增加，水稻的种植面积也应该得到增加。在种植的种类方面，不同种类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也得到推广和种植，仅铜仁一府的水稻就达44种之多^②。水稻的大面积种植无疑将会推动经济的发展。

经过明末清初的引种，到清中期，高产的旱地农作物如番薯、玉米、马铃薯等在黔东南地区也得到了较多的种植。如松桃厅在嘉庆初年以后，乡民“栽种桐茶诸树及种苞谷、番薯等物”；洋芋（马铃薯）在这一时期也得到推广，黔东南地区的马铃薯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区，多为玉米与洋芋套种，“明代铜仁地区的豆类即达二十种以上，高粱有五种之多。”^③从明代统治者对百姓的榨取情况来看，也可以证实黔东南粮食产量有较大的增加。如明以前，统治阶级勒索人民的纳贡主要是马匹、雨毡、布匹和丹砂、水银、雄黄等物，到了明代，除了上述贡物外，粮食作物也成了统治阶级向劳动人民榨取的主要物品，而且数目相当大，地方封建主的田租剥削，也以粮食作物为主。这种情况也从侧面说明了粮食作物有较大发展。这些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与推广，促使这一时期持续的垦殖和扩张。这些农作物不仅适合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地区，而且属于高产耐旱作物，而黔东南坝少山多，土地贫瘠，水资源缺乏，此种情况下，适合山地生长的耐旱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将会大大促进人口的增加和山区的开发，对黔东南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相当明显。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使黔东南农业种植实现了从一年一熟制向一年两熟制的转变，从而提高了土地复种率，使同样面积的耕地可养活更多

①（嘉靖）《思南府志》卷七，《拾遗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48页。

②（民国）《铜仁府志》卷七，《物产》，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③ 周元春：《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的人口。这一方面适应了清代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提供了可能。

（二）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发展

除了粮食作物以外，各种有很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如棉花、茶叶、桐树等在明清时期的黔东地区也遍地栽种。

棉花属于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黔东地区在明清时期已开始种植棉花。《印江县志》记载“印江的棉花种植始于明代，气候、土质适宜种植棉花。在1949年以前因耕作技术落后，品种退化，无农药器械，平均亩产十五公斤”^①；（嘉靖）《思南府志》中也把棉花归于“货物”一类。^②在黔东地区的其他县志中也有一些关于棉花的记载。从这些关于棉花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棉花在明代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种植，而且“种之获利”。在封建体制下，能广泛种植且可以获利的棉花无疑会对经济发展起着较大的刺激作用。

明清时期，茶叶也是黔东重要的经济作物，据《石阡县志》记载：“城南五十里，包溪、大方一代，产茶最富，岁约十余万斤，东贩于湖南长沙，北贩四川酉阳，近运至贵阳出售。”在重农抑商的社会，能够长途贩运还能获利，这证明茶叶确实在当时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从《贵州通志》载“石阡茶、湄潭尖茶皆为贡品”也可以看出茶叶当时在黔东地区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茶经》中也有关于铜仁产茶的记载。其实，黔东产茶不仅仅限于石阡和铜仁，其他区域也有出产，这在黔东一些县志中有零星记载。

除此之外，黔东地区在这一时期的经济作物还有油菜、鸦片、麻、烟草、桐树、卷子树等，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异地商人行走于黔东大地，这样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加强了农民与外地的沟通，使农民眼界变得更开阔。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广大农民开始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使整个黔东地区的经济作物种植范围更广、产量更丰，在黔东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①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写委员会：《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87页。

^② （嘉靖）《思南府志》卷三《田赋志·土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60页。

二、水陆交通的发展

元王朝统一全国后，结束了贵州经制州、羁縻州的局面，于是广设站赤 1383 处，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络，史称“梯航必达，海宇会同”^①，为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桥梁，尤其对贵州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到至元十七年（1280 年）年底，因“罗氏鬼国土寇为患，思播道路不通，发兵千人与洞蛮开道”^②，开通了湖南经思州播州的道路；1282 年，这条道路通到云南；1283 年因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的“九溪十八洞蛮僚，叛复无常”，于是打通了四川进入贵州的南北通道。到了明代，《明实录·洪武实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 年）年底，曹国公等奏：“贵州今隶湖广，而其地在成都西南，计成都水路至重庆二十六驿；重庆陆路至播南九驿；播南陆路至贵州六驿。”换言之，洪武四年（1371 年），思州可通云南、四川、重庆、贵阳等地，在《明实录》中，多次记载有缅甸入京进贡的事。譬如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在洪武年间几次朝贡，贡品是大象和犀牛，因为路过贵州，便同思州宣慰使田大雅一起入京。另外，《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湖南经贵州连接曲靖到云南的道路已开通，在这一条道路中，镇远为一重要的水站，这条道路的开通使云南与内地的交通，从经四川为主改为由贵州东进为主。^③ 有明一代，全国主要干道有四条，其中一条就是经镇远连接湖广（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以后曾经做过云贵总督，在他的日记中，记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五月底至六月初，缅甸使者几批经过镇远）。这些道路的开通加强了黔东与外界的联系。清代的黔东，在明代道路的基础上对交通道路进行整治，其中开通了台拱至施秉的道路；为镇压石柳邓起义，清政府开通了正大营至松桃大道，以及思南到铜仁的道路。

得益于乌江之便，这一时期黔东的水路交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洪武十四年（1381 年）九月，明王朝统帅傅友德率 30 万大军从四川、湖

① 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9 页。

② 爱必达：《黔南识略》，道光二十七年重刻本。

③ 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0 页。

广远征云贵，大量粮草运输就取道乌江。这些见诸史籍的记载几乎都是军事用途，大约因为他们多与朝廷兴废有关。其实乌江航运更多为民用，其中最大的运输货物就是食盐。食盐在四川数处购买后运入贵州，其中一半运到思南销售。清代的历史更为清晰，川盐运抵重庆涪陵后上溯乌江，经龚滩、新滩、潮砥等处盘滩转运贵州沿河、思南，再分销石阡、铜仁、镇远以及重庆秀山，每年都有数百万斤川盐辗转入黔。^①因为关系民生，又有利可图，故盐为官办商运。乌江航运由此兴旺。

由于盐运的拉动，大量川、陕商人进入贵州，在乌江两岸收购桐油、生漆、五倍子等土特产品，由乌江下运出黔。乌江上运食盐是主要货种，贵州航运肩负着松桃、秀山、沿河、德江、思南、石阡等食盐运输任务，每年从涪陵发出上运食盐 2500 吨，下运皮张、猪鬃、桐油、木油、硫黄、五倍子、野生药材。

到嘉靖年间，川盐半数经乌江运至思南销售。清代，川盐经涪陵由乌江转运沿河，水陆兼程运至贵州的铜仁、印江、石阡、思南、镇远，四川的酉阳、秀山，湖南的花垣、凤凰、麻阳等地，每年达数万斤。而川陕商贾在乌江沿岸收购桐油、卷油、生漆、五倍子等土产外运出境，乌江航运由此繁忙。思南以上至文家店段水运“每逢沿江各地场期，月夜更阑，可闻啾啾舟楫之声，开乌江夜航之独创”^②，繁忙景象可见一斑。

明清时期，黔东的道路主要因为军事目的而开通，使黔东与四邻各地形成了一个交通网，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与外界的商业联系，加强了黔东与中央王朝及四邻的联系，促进了黔东的经济发展。当时铜仁的货物（如鸦片、木材）就是通过辰水（锦江）、沅水最后销售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时期黔东出现了许多会馆，如铜仁、思南、石阡等地均有江西会馆（万寿宫）、四川会馆（川主宫）、两湖会馆（禹王宫）、两粤会馆（南华宫）等，这些会馆有的尚存，有的已毁。这些会馆的建立反映了当时黔东交通的发展，也反映了黔东商业的繁荣。

^① 何赞：《思南方言程度表达法研究》，西南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3 页。

^② 安元奎：《乌江盐油古道及其对贵州土家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铜仁学院学报》2011 年第 4 期。

三、城乡市场流通网的建立

城乡市场流通网的形成，既是明清黔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商业城镇的发展，以及农村市场的发展，这是城乡市场流通网中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而商人的经营活动，对于沟通城乡市场，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一流通网黔东各地与外界很多地方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一）商业城镇的发展

黔东商业城镇的兴起是与交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相伴随的。黔东的商业城镇最早始于交通沿线，另一方面，原先是行政中心的地方大多增加了经济功能，有些还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

作为“水陆码头”的镇远，正处在滇黔驿道与沅江水道的衔接点上。溯江而上的船只只在镇远启程，古驿道上的“百代过客”在此登舟，顺舞阳河下沅江，过洞庭，泛舟长江直发东南沿海。商贾云集，致使镇远成为“西南一大都会”。往来如织的人流，带来各种文化，在镇远形成一个回环激荡的漩涡。汉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在此接触、碰撞、交融，中原、江南、江西、两湖、巴蜀、闽粤诸种地域文化“盆景式”地移入镇远。明中期至清前期是镇远商贸发展的鼎盛期，这里商人云集，行成了八大街市。“外地客商，无论溯江而上，或驿驰而来，大都在此驻足，他们结伴而来，定居于此，专事商业活动，在城内形成了沙湾市、辰州市、南京市、江西省、饶州市、普定市、州街市、东关市。”^①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驱使下，到清前期，这些街市已趋于成熟。这些街市商铺栉比鳞次，繁荣无比。明清以来，锦江（辰水）水运发达，锦江横贯东西，至辰溪县城注入沅水。外商经辰水进入武陵山区。从宋、元时代起，沿锦江水路有湖南、江西、四川、湖北商人来铜仁经商，相继建立了川主宫、万寿宫等商人会馆，出现了“舟楫往返，商贾云集”的盛况，成为湘、黔、渝、鄂四省（市）边区的商品

^① 李镇江：《明清名城镇远繁荣无比的街市》，《理论与当代》2011年第4期。

集散地。商业的繁荣使铜仁发展成为明清时期的商业城市，至今铜仁老城内还有明清时期的城市原貌，从这些建筑可以看出当时商业的繁荣。在石阡城内，也还有许多这一时期的建筑，从石阡温泉出发，沿步行街到石阡老到大桥，靠河边的木结构房屋大多都是这一时期的建筑，杨家巷、曹家巷还保留原貌，石阡万寿宫（2001年6月立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是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建造的会馆。

除了上述各地外，黔东其他地方也有商业城镇的兴起。黔东自古是商家必争之地，川盐从乌江运往思南，再水运至石阡府，陆运至铜仁、镇远等地，每年上万吨。川商云集乌江沿岸，上运食盐，下运桐油、生漆、油茶、青麻等土特产，沿江形成了一批商业和手工业场镇。商业城镇的繁荣促进了明清黔东经济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又推动了商业城镇的兴起，这一良性循环在明清时期对黔东经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市场的发展

农村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市历史悠久，但它的大规模发展则是在明清，这一时期黔东的农村市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明清时期，石阡县内万安乡、北塔乡（今属汤山镇）、龙洞乡（今属大沙坝乡）等，家家户户有纺纱机，妇女织布除保证全家穿用外，还可以拿到集市上换钱粮。^①另外（光绪）《石阡府志》记载：郡西关上下河坝，场期为一四七日。石家场，离城六十里；龙塘场，离城三十里；本庄场，离城一百里；龙碛场，离城二十五里；新场，离城六十五里；桶口场，离城八十里。这些集市场是以石阡为中心发展的，在石阡商业城市发展的基础上，这些集市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农村集市的发展是商品流通的基础。《思南府志》中记载了康熙年间的集市概况，本城场，在城南门外，每月逢二八赶集；都坪场，距府城九十里；大兴场，距府城六十里；平牙场，距府城九十里；大有场，距府城二十里；罗家山场，距府城三十里；小铺场，距府城十五里；转水场，距府城四十里；田岩场，距府城七十里。到了道光年间，思南府的墟市数量共计119个，其各地墟市数如下表：

^① 戴金杉、林文化：《独特工艺彰显民族神韵——石阡县民族服饰》，《贵州日报》2006年1月10日。

道光年间思南府墟市数量表^①

	府属	安化县	印江县	务川县
东路墟市数	5	5	7	7
南路墟市数	10	5	6	3
西路墟市数	6	8	4	2
北路墟市数	15	20	3	13

沿河县在嘉靖年间，有观音寺、沿河、宋家场、天乐井场、大度场、苗埡寺场等集场，到了清代，除了宋家场、大度场、天乐井场不再是集场外，新增加了官舟、沙子、晓景、捷克庄、淇滩、夹石、黑濑堡、瞧家铺、思渠、土地坳、洪渡、老后坪、毛家渡 13 个集市，加上原有的共 16 个集市，并已经形成了各自每月赶六场的固定场期。

就集场的密度而言，一个地区的集场要受到所处地理条件和经济水平以及交通状况的影响，地理条件越优越，交通越便利，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集场的密度也就越高，反之集场密度较低。如思南府“墟市大小方聚集，每逢集期，沿集不等，一二十里村民摩肩交易”^②，松桃直隶厅“城市乡场，蜀、楚、江西商民居多，年久便为土著。……贸易以赶场为期，场多客民，各立客总，以约束之，场以五日为期”。^③但在思州的集场大多在 30—40 里之间。根据《黔南识略》记载，乾隆至道光年间，黔东的一些地方大致集市数如下：石阡府 23 个，铜仁、思南以及印江 5 到 10 个，思州 12 个左右，安化县 17 个左右，镇远有 20 个以上。这一时期，黔东在交通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集场网，这些集场的发展，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村集市是大规模、长距离的商品流通的基础，农村集市也是保证小农经济与再生产正常运行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黔东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农民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

① 李仕波：《清代贵州农村集贸市场探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② （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一，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③ 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十，《松桃直隶同知》，道光二十七年重刻本。

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就越大。

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络体系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为黔东各地区之间，黔东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必要条件，对黔东经济的发展意义尤为重要。

四、贵州建省及黔东的改土归流

统治者的政策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导向作用，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统治政策的改变对黔东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设立布政使司，贵州第一次有了省一级建制，成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明初今贵州土地上有四大土司：贵州宣慰司，思南、思州、播州宣慰司，各据一方，互不统属。一起偶然事件，让明王朝下决心在贵州建立行省。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两叔侄因争沙坑地而举兵相残，屡不接受朝廷的禁令，明王朝为了“不可令田氏遗孽复踵为乱”^①，在两宣慰司境内设置府、县，借以解决争端为借口，朝廷命令顾成率兵弹压。“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顾）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置贵州都指挥使，领十八卫，而以长官司七隶焉，属兵部。”^②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王朝在解决田氏争端后，将思南地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思州地置思州、石阡、新化、黎平四府，废除了思南、思州两宣慰使司。至此，明朝廷直接控制了思南、思州、镇远、石阡等府，这样，贵州境内4大土官田氏两宣慰使司就被彻底解决了。随着在黔东、黔东南境内8府的

① 周春元：《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② 《明史·土司传·列传第二百四·贵州土司》，中华书局1974年版。